

南洋學會叢書第十六種

新嘉坡華族會館志

第一冊

吳華著

南洋學會出版

138
G708
207

吳華著

新加坡華族會館志

(第一冊)

老五陳允浩題



一九七五年

南洋學會叢書第十六種

一九七五年十月廿九日

PREFACE

The need for social identification and mutual assistance among the Chinese of early Singapore is reflected in the wealth of associations that were created, many of which were no doubt based on, or modified from, those which were found in their country of origin. These associations performed various functions such as initiation, induction, mutual protection, social service, entertainment, etc. which were basic necessities to a newcomer in a strange land. Unfortunately attention in the past had been focussed on the negative aspect of such associations, in particular on the anti-social activities of the so-called "dangerous" or "secret" societies. This, however, is understandable, as the latter were likely to attract attention not only by their blatant lawlessness, but also by their exotic and bizarre sub-culture. By comparison, the other associations appeared to be too much taken for granted by the Chinese on account of familiarity, and ignored by the non-Chinese as unworthy of attention.

This, however, is changing. Maurice Freedman, for example, in an article entitled "Immigrants and Associations: Chinese in Nineteenth Century Singapor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ume III, Number 1, October 1960) considered the associations which the Singapore Chinese created and modified in the cours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made a number of penetrating observations. Charles Gambar, in his paper on "Chinese Associations in Singapore"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ume XXXIX, Part 2,

December 1966) described some of these associations in Singapore and indicated the opportunities available for a deeper study into the various phases of their development. With rapid social changes threatening to erase the entire fabric of traditional patterns of living in Singapore, it is perhaps all the more necessary that research into these interesting institutions be encouraged and undertaken.

The South Seas Society, therefore, welcomes this opportunity to make available to a wider public this valuable collection of material relating to the Chinese associations of Singapore — a collection which was assiduously made by Mr. Ngow Wah over very many years. It is hoped that Mr. Ngow will continue this labour of love and make available further material so as to make the collection as complete as possible.

GWEE YEE HEAN

**South Seas Society,
Singapore.
January 1975.**

陳 序

對歷史學者或是社會學者來說，這部書是他們相當適切需要的工具書。近四十年來，關於海外華人史的研究，有個新的趨勢，學者們跨越了圖書館大門，跑進市鎮鄉村各種社區，從事觀察踏勘，對此中大大小小的社羣，進行調查和分析，求取觀點和概念，來理解歷史的實際。以人類行為為對象，應用各種方法來塑造社羣的模型和範典。

進行社會調查工作，必須具備相當素養，把所要研究的社會體系定下一個精細計劃，瓶發學術探討與方法運用：一方面理解了社會的實際，一方面尋找文獻的印証。取得一個正確的觀點來推究一個站得穩的概念。不管是用宏觀層次歸納到對一個微觀層次，或是用微觀層次來衡量宏觀層次。為達到深入社會體系的研究，對計劃的擬定和安排不可不痛下工夫！

本書作者勤於搜集資料，竭盡數年之力，羅致不少文獻。由於掌握大量的資料，不管是文字的或是口述的，使他獲得有益的啓示，因而寫成這部著述，對新加坡社會提供一個明晰的概念。在概念與資料方面又有着很好的結合。

我覺得華人性格上特別是人際關係，總是依賴社羣取向。新加坡華人社羣有着分解的現象，這現象的顯示，並不意味着社羣分裂，例如福建幫的結構：有省級組織的福建會館，有府級組織的漳州會館，又有縣級組織的龍溪會館，最小的一個福龍茂（福建龍溪許茂），是個社區結集。這種支衍，我們稱之為「環節分解」。在社羣機能上，最小的一個環節擺脫了大羣，獨瓶小羣結集，經過仔細的分析，這小羣卻往往支配着大羣，甚而控制整個

新加坡華人社會。最顯著的一例：中華總商會，全坡最高的華人機構，會長一職，由福幫一人連續繼任數屆，而其所以能撐持這種局勢，不外靠它那最小的一個環節，掌握着最大的投票權。一個擁有最高權威的會社，竟由一幫通過一人支配。雖然多年來發生劇烈的爭議，有人大聲疾呼，廢除幫派，談何容易，幫的結構是盤根錯節地相互糾結。想把它連根拔起，要看歷史演進到什麼程度，構成什麼類型的社羣，然後能因勢利導。此時此地，正待我們深入分析，看各個社羣的取向如何位育一個新的格局。我們前面說過，華人性格上的人際關係，是依賴社羣取向的。

一個幫羣的結集，它的整體可以擴到全國性、國際性，甚至全球性。一個小環節，怎麼能作出龐大的機動性能，而控制整個社會？如果我們把社團際的功能作出分析，便可看出整體與個體的關聯，辨出領導層的歸屬；如果我們好好地抽釋這部書的記錄，檢取各個團體的執事關聯，再求得這羣執事交往頻道，便不難求出領導層的風雲人物。關聯關係最多的人物，便是支配或影響社羣的領袖人物了。

我提出這些議論，都是從本書引發出來的，海外華人史研討方向，我希望這淺近的敘述，能够採擷本書的重點，激發年青一代的歷史學者、社會學者，提起興趣，共同看清我們自身的處境，培植一個不可動搖的認同感。

陳育崧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五日

許 序

吃閉門羹，看冷面孔，跑得腿痠，晒得汗乾，吳華憑這一股傻勁，三年如一日，終於把三十餘萬言的《新加坡華族會館志》完成了，付印了，殺青了。他要我寫序，我知道他的實情，明瞭他的艱辛，且將我的觀感寫出，以與作者、讀者共勉。

這一份工作的艱巨是有目共睹的，除了有傻勁如吳華般的人外，誰都不敢輕於嘗試。但有些人自己不敢做，却要人家也不做，於是唱起高調來，說這份工作太艱巨了，非多人分頭進行不行，一個人單槍匹馬是做不成的。然而事實勝於雄辯，調查工作不但已完成，全書寫就兩厚冊亦已殺青，如果要等志同道合的人來分工合作，恐怕再過十年也無法完成。中國有句成語說：「一個和尚挑水吃（兩桶），兩個和尚扛水吃（一桶），三個和尚沒水吃。」這是華人的劣根性，所以華人只有孤軍奮鬥的學者，而沒有陣容嚴整，步伐一致的學術團體。

吳華固然成功了，有人恭賀他，有人稱讚他，又有人來訪問他，可是還有人重提舊話，說吳華固然成功了，但如能多人合作，相信篇幅會更多，貢獻會更大，流傳會更廣，所以他化費的精力是很可惜的！——真的可惜嗎？如是真的，那麼我要請說這話的，不要只出嘴，站出來，身體力行，號召一班同志，分工合作，做一件調查工作，編一部專書出來，示範示範，好得星華社會題材俯拾即是。

只出嘴的人是很可怕的，他的嘴不啻核爆中的中子，被他擊中立刻會引起連鎖反應，廣島、長崎，因之毀滅而震驚世界！不過出嘴巴的祇是說一套他的理論，那是無質無量的，所以不會驚

天動地攪得鬼哭神號，然而他却也能自我陶醉，如阿Q那樣覺得飄飄然了。因為理論是他的高驕，所以他跑來跑去總是高人一等。可是玩火者不免引火上身，如有人將他的中子去撞擊他理論的核子時，那就慘了！

吳華很謙虛地對我說：「我不懂理論，不能有所發揮！」我說：「你搜集那許多材料，將星華社會的血緣、地緣、業緣的組織和活動，呈獻在讀者之前，就是最大的貢獻，也已盡了你最大的責任，不再需要什麼理論，材料都已齊備，讓喜歡發揮的人去發揮吧！你不用自卑！全世界有史以來最大的發明家不是愛迪生嗎？他對電器发明的多和實用，是任何一位電學專家所望塵莫及的，然而他不是一位專家，也不懂任何理論，他只知道實用，所以他的發明都是實用的。電學專家只有在理論上攪花樣，一遇到實用便碰壁了。如果有人要以理論折服你，你就教他也寫三十萬字出來再講！」

吳華所做的，誠然是披荆斬棘的拓荒工作，如果沒有拓荒者，怎能耕地播種？怎能秋收冬藏？所以先驅者的事工，最值得歌頌。星華社會，除了會館一端外，尚有許多項目等待我們去發掘，去整理，去著錄，不愁無用武之地，只要有決心、有毅力，持之以恆，必有成就。吳華在工作過程中，誠然有人潑冷水，但並非沒有鼓勵他、扶持他、引導他的人，這些人在吳華的成就上，佔有一部份勞績，也是不能否認的。若說要羣策羣力地合作，這已够了，相信吳華也能承認！

清代大文學家兼大史學家龔自珍，做了二十年的小京官在南歸途中，曾寫一首感慨而又自負的詩：

河汾房杜有人疑，名位千秋處士卑。

一事平生無齟齬，但開風氣不爲師。

他的文章已在北京開了風氣，他的思想却遭頑固派所反對，其實也是開風氣之先的。現在吳華的工作，也可以說是開風氣的工作，單槍匹馬在社會調查的領域馳騁，而有所成就。反顧以往，曾有過好幾批人，以集體行動方式進行調查，進行研究，不久都沒有下文了，因此這風氣還得讓吳華來開。憑以往的經驗，我們不敢希望有一個學術團體會來做這種工作，却希望多出幾個吳華來「但開風氣不爲師！」

許雲樵於東南亞研究所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崔 序

我與吳華君的結識，始於二十年前，那時我們同是新加坡中正中學的同學。嗣後，我們又不約而同地在柔佛峇株巴轄華僑中學教書，朝夕相處，使我對吳華君有更深一層的認識。吳華君是一位篤實而勤勉的學人，談吐談諧，喜歡舞文弄墨，常用各種不同的筆名在報上發表其心得。

日前，吳華君以其近著「新加坡華族會館志」相示，並囑我寫一篇序言。我不善於寫序，但抵不過吳華君的夾纏，也欽佩吳華君的心血結晶，因此不揣謏陋，交差獻醜。

華人是個傳統籍貫觀念特別強烈的民族。據名史學家何炳棣的分析，其特殊原因有：（一）有關儒家「孝」的禮俗和法律；（二）有關官吏籍貫限制的行政法；（三）科舉制度，（見中國會館史論第一頁）。

據何先生的研究，遠在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初，南方幾省在北京建立會館的郡邑已經不少，北方則無。陝郡邑亦已開始在京建立會館（見同上書第十六頁）。由此可見「會館」之產物，是古已有之。至于華南沿海諸省華人之移殖海外，在各地建立的會館，只不過是中國傳統組織在海外的翻版。

新加坡的華族社團，大抵是建立在地緣、血緣與業緣的基礎上。雖則業緣的組織有超畛域之趨勢，但鑒於華族有某一方言羣體壟斷某一行業的現象，故地方色彩顯而易見。因此，華族社團的地方性組織，充份表現了華族社會幫派色彩的濃烈，構成了華族社會之特質。有人甚至說「華僑是幫會之動物」，「幫會即華

僑社會」（見吳主惠，華僑本質の分析，第一三四頁）就是這個意思。

幫派式的華族社團，在早期新加坡的華族社會中，起過了積極的作用。它們不僅是聯絡鄉誼的所在，更是互助互惠的機關。對於華族資本的籌措與經營企業之成功，居功厥偉。但華族社團雖有利於小集團的團結，却使整個華人社會分化，幫派間的隔閡與仇視，阻礙了華人社會的進步。

不過，新加坡也曾經出現過超畛域、超幫派的社團組織，那是同濟醫院與中華總商會的創立。前者創於1867年，（但陳育崧先生却以1885年爲宜，見同濟醫院百週年紀念特刊，第十一頁），後者成立於1906年。這兩個社團的組織與管理，都是不分方言羣體，都是以新加坡全體華族爲服務的對象，確實是新加坡華族社會史上的里程碑。

美國名學者 W. G. Skinner 在探討泰國華人的社團發展後，曾提出這樣的結論：那些勢力比較單薄，經濟比較低落的方言羣體，愈早認爲有必要組織起來，以維護自己的生存與發展。廣府人、瓊州人與客屬人在泰國人數較少，經濟地位較差，所以他們的會館早在1877年，1900年及1909年便成立了。至於人數眾多，財雄勢大的潮州人，其最早的組織要等到第一次大戰後才出現（見 *Chinese Society in Thailand*, pp. 167—168）。據吳華君的著述所示，新加坡早期社團的組織，似乎也有這種趨勢。

新加坡的華族社團林立，觸目皆是，要研究新加坡華族社會史，必須先要瞭解華族社團的歷史。但由於社團林立，檔案散佚，使人有不知從何着手的困惱。吳華君能以個人充沛的精力，埋

首翻閱資料，奔走訪問，好容易才把新加坡的重要社團整理出一個眉目，值得我們慶賀與重視。

吳華君的「新加坡華族會館志」，概括性地論述了各重要地緣、血緣與業緣的社團，內容充實，文筆流暢，既能幫助一般讀者的認識，也可以作為學者研究的基本參考書籍，我很樂意推介。

最後，但願吳華君能百尺竿頭，再進一步。

南洋大學歷史系主任 崔貴強

寫于一九七四年九月廿五日

自序

本書以「星華社會傳統組織」一文為導論，並分別介紹地緣性會館，宗親團體及行業公會。

地緣性組織一般均稱為「會館」，「同鄉會」；血緣性團體則多稱為「公會」；而業緣性的組織則稱為「公所」或「公局」。因此，本書定名之時，曾再三的考慮。

這裡讓我們看看「會館」一詞的定義。

何炳棣在「中國會館史論」中對「會館」的解釋是：

「會館是同鄉人士在京師和其他異鄉城市所建立，專為同鄉停留聚會或推進業務的場所，狹義的會館指同鄉所公立的建築；廣義的會館指同鄉組織……。」（註一）

「辭海」對「會館」一詞之解釋：

「（一）旅居異地之同鄉人，歲時集會之館舍也，其名稱亦有稱為公所者；其宗旨為聯絡鄉誼，及救濟同鄉在旅居地之貧病死亡者，其經費概由同鄉人捐助之；其設備除集會居住之館舍外，尚有公墓，殯房等；亦有舉行施醫施藥等慈善事業者。各大都會商埠均有之。光復後，均就會館設立同鄉會。（二）同業商人公共集合之館舍，亦稱會館，又稱公所，凡同業之規則行情在會館內公議之，亦有以會館為同業交易之場所者，如錢業會館，木業會館等皆是。」（註二）（本地則有八和會館、軒轅館等）。

從上述的定義看來，雖然血緣性的組織未見包括在內，但是，新加坡華族的血緣性組織中，亦有稱為會館的，如曹家館、古城會館、陳氏會館、台山黃家館等，因此「會館」一詞，亦應包括血緣性組織在內。

所以，本書乃定名為「新加坡華族會館志」。

在「星華社會傳統組織」一文中，對於新加坡華族社會地緣、血緣、業緣的組織曾予以概要的分析，此外，又另選具有悠久歷史的地緣性組織，宗親會及行業公會，加以個別介紹。

深感遺憾的是，未能介紹更多的團體，這主要的因素乃是蒐集資料的困難。比如，北城行、台山黃家館、鳳廓汾陽公司等都是逾百年歷史的會館，但是由于其檔案文件失存，以致未能更詳細的敘述。

本書第一冊，除了「星華社會傳統組織」一文外，另介紹主要的地緣性團體；第二冊則介紹血緣性組織；第三冊則介紹行業公會。那些未被列入第一、二、三冊的會館將繼續搜集資料和撰寫，以期將來再版時加以編入。

本書插圖乃為逾百年歷史之會館及各幫主要的會館。由于篇幅有限，未能收集更多的圖片，甚感歉意。

本書撰寫匆促，倘有錯誤之處，懇請讀者及各會館負責人予以指正。

吳 華

一九七四年十月五日

註一：何炳棣，「中國會館史論」，頁11。

註二：「辭海」，（中華書局印行），頁655。



个已拆除的曹家馆舍。



← 寧陽會館大廈

↓ 寧陽會館舊館舍





↓應和
會館外
貌。



个矗立在
里峇峇利
律之「應
和大廈」。